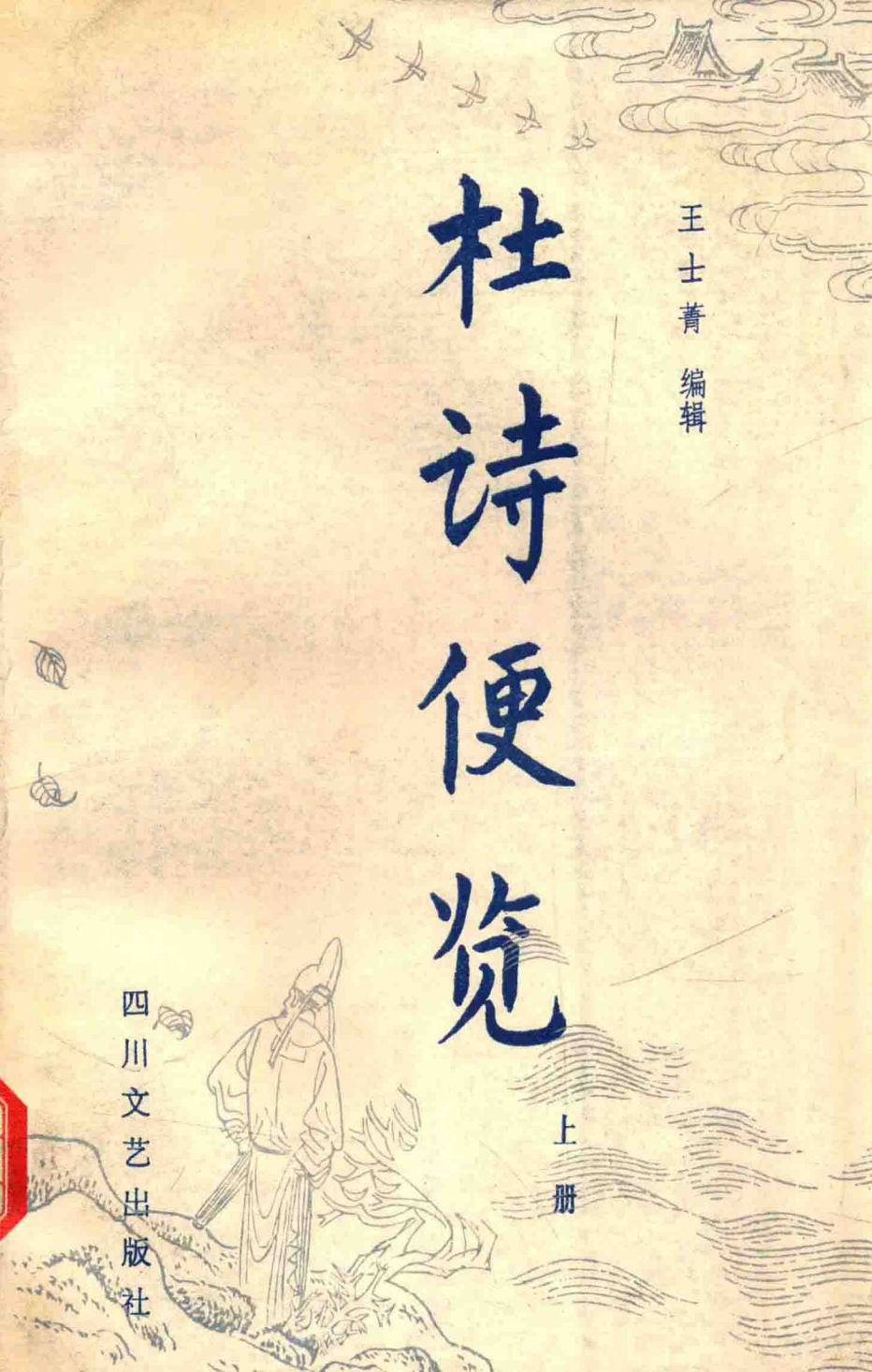


杜诗便览

王士菁 编辑

上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王士菁 编辑

杜诗便览

上册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金成礼

封面设计：邱云松

版面设计：陈 维

书名 杜诗便览（上·下册）

编辑 王士菁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

1986年4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50.625

印数 1—2,950 册

字数 1056千

书号：10374·22

定价：10.20元（全二册）

凡 例

一、唐代诗人杜甫现存一千四百多首诗篇，经过历代学者、专家的辑录、考证、校勘、分类、编年、注释等一系列整理工作，已成为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见于著录的杜集（包括全集和选本）约在百种以上，其中较有影响者亦不下数十种。自宋以来，辑注杜诗者，号称“千家”。宋郭知达为“便于观览，绝去疑误”，编成《九家集注杜诗》，作了良好开端，有益于后学者非浅。今为节约读者时间，且省翻检群书之劳，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汰其重复，汇为一编。取名《便览》，即含有便于“观览”或“浏览”之意。

二、本书正文主要依据一九五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宋本杜工部集。编者在进行编辑工作中，遇有错字、漏字、有题无诗者，则用过去整理加工较多、流传较广的“仇注本”（同时也对照“钱笺本”、“朱注本”、“杨注本”等）参酌改正、填补。宋、元刻本，字句互有异同（有时且相差甚大），必要时也用作参考，但不作为主要依据。实践证明：经历代学者、专家认真整理过的版本，对于杜诗字句（包括诗题）的斟酌取舍，往往优于旧时坊间书估刻本。刻书时间的先后，可以

作为研究版本的一种依据，但古本不一定就是善本。泥古非今，习非成是，据其所知，改所不知，抱残守缺，穿凿附会者，往往有之。烦琐校勘，实为蛇足。客观罗列，徒滋纷扰。无益于广大读者，甚为编者所不取。

三、本书注释主要依据自宋迄清较为著名的注本，着重点在于杜诗史实考证和艺术分析两个方面。诸家意见相同者，一般采用较早出现的注文；诸家意见不同者，则采取通常认为比较准确的一种，其他如有参考价值，则列为“备考”；诸家意见可以互为补充者，则酌情并存。各家注文如有谬误，或词不达意者，编者尽可能参考古代或近代研究成果，加以订正或补充。历代诸家及近人论杜有可供参考者，也酌量收入。编者认为：对于历代杜诗注释也应采取批判地继承态度，比较诸家注文之异同，取其简明、扼要而精确者。杜诗有无注而自明，亦有因误解而反晦者，昔人注杜，每务博矜奇，繁征远引，“天棘”、“乌鬼”，聚讼纷纭，月露风云，俱烦疏解。考证愈繁，诗意愈晦。有识之士早已讥其无当。编者力求避免牵强附会，望文生义，伪造故实之弊；力求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以见杜诗之真面目。烦琐考证，冗赘空谈，无益于读者，盖从删芟。本书目录之前，附有历代注杜主要参考书目，所列大都为通常易见之书，而非孤本秘笈，可供读者复按，或作进一步探讨。

四、本书正文编排，采取编年而不采取分体或分类办法。编年次序主要依据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同时并参考其他版本编排次序，以及古人和今人所作杜甫年谱，稍作变动和调整。编年有助于知人论事，分体也有助于艺术揣摩。清浦起龙读杜心

解分体目录，亦可资参考；其他分门别类办法，无重要意义者，可以从略。

五、本书分卷主要依据杜甫生平和创作活动具体情况，而不是按照篇幅多寡。每卷之前，略加简短说明。这种不同于历代诸家分卷的办法，只是试尝，未必妥当，仅供读者参考。

六、本书正文之前所附前言、年谱简编和参考书目，书末所附杜甫传记资料、杜集重要序、跋、题记等，也仅供读者阅读正文时参考。

前 言

远在一千二百多年以前，伟大的唐代诗人杜甫（七一二——七七〇）创作了光辉灿烂的诗篇。毫无疑问，这份优秀的古代文化遗产应该由我们来继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特别是作为创作社会主义新诗歌的借鉴，更具有重要的意义，有无这个借鉴，是大不相同的，这里有文野、粗细、高低、快慢之分。为了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新诗歌的创作，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当然，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新的创作，那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替代的。

一 关于杜诗的版本

杜甫的诗篇是经过了时间考验的，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现存约有一千四百多首，在唐代诗人作品中除了白居易的以外，算是流传最多的了。但白居易的诗是由作者自己生前苦心经营并借助于他当时的名声和地位才得以保存；〔一〕而杜甫的诗，在他生前就已经散失不少，现存的

〔一〕 参看白香山集卷六十一东林寺白氏文集记、圣善寺白氏文集记和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则是在他死后由别人陆续收集起来的。这些收集和整理工作，也大半出于爱好者的自发努力，而不象王维的诗集那样，它的编成系出于皇帝的意旨。〔一〕

据有关杜甫的文献记载：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本传说他有文集六十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亦载有杜甫集六十卷、又小集六卷（润州刺史樊晃集）。新、旧唐书虽有著录，但在当时却已为人们所罕见。从樊晃的小集序中，我们可以窥见杜诗在唐代流传情况的一斑。〔二〕当时虽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但“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所知。”而“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故樊晃“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且行于江左。”从小集序看来，樊晃还想继续收集，但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继樊晃之后，收集和整理杜诗者见于记载的有晚唐顾陶、五代孙光宪、郑文宝、北宋孙仅等；此外还有一些人也在传抄，但“皆亡逸之余，人自编摭，非当时第次”，〔三〕仅在爱好者之间流传而已。北宋苏舜钦曾经收集过杜诗三百余首，在景祐三年（一〇三六年）编为杜子美别集，但也没有保存下来。

第一个把杜诗编成较为完整的集子的是王洙。从他在北宋宝元二年（一〇三九）写成的序中得知，他从皇家“秘府”，到“通人”所藏，共蒐得杜诗九十九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

〔一〕 参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四十王维传。

〔二〕 参看本书的附录杜工部小集序。

〔三〕 参看本书的附录王洙杜工部集序。

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视居行之次，与岁时为先后，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一〕和王洙同时或稍后，王安石也在收集和编辑杜诗，并于皇祐四年（一〇五二）写了一篇杜工部诗后集序。〔二〕这部后集和苏舜钦编的别集一样，也没有流传下来。在当时，所谓“小集”、“别集”、“后集”……等类的本子，可能是不少的，而王洙编辑的这一部杜集则比较完备。“天下士人所得者，悉编入之。”在他编成此集之后二十年，即北宋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又由王琪、何瑒、丁修等作进一步编辑加工，刊行问世。“于是杜诗无遗矣”。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杜诗最早的本子。〔三〕

这个本子是否就很完备呢？当然不是。不但今天看来它是不完备的，就是当时的人们也只认为是比较完备的。与“王洙本”同时，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版本，可惜都已不传了。因此，这个包括当时某些版本的优点的“王洙本”就为以后的各种版本奠定基础，成为后来流传的杜诗的“祖本”了。“今世所行杜集，不可以计数，要必以此本为祖也。”“自后补遗、增校、注释、批点、集注、分类、编韵之作，无不出于三王之所辑梓。〔四〕

这个“王洙本”，传说它的初版曾经销行过万部（这不免有些夸张），但流传到明代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时即已残缺不

〔一〕 参看本书的附录王洙杜工部集序。

〔二〕 参看本书的附录。

〔三〕 参看本书的附录王琪杜工部集后记。

〔四〕 参看本书的附录毛扆杜工部集跋和张元济宋本杜工部集跋。

全。汲古阁书散出后，有一个宋槧补钞本递归潘氏滂喜斋，今归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此书时，又用北京图书馆所藏该书钱氏述古堂另一影宋抄本，补充上海图书馆藏本。这就是本书用为底本的，到目前为止比较完备的“王洙本”。

此外，后于“王洙本”的有绍兴三年（一一三三）“建康府学所刻版”的“吴若本”。这个“吴若本”就是吴若根据“王洙本”重新校订刻印的。清钱谦益笺注杜诗，就用这个本子做底本，他认为：“杜集之传于世者，惟吴若本最为近古，他本不及也。”〔一〕宋朝南渡以后，杜诗的价值为更多的人们所理解。绍兴六年（一一三六）李纲为杜诗作序中所谓：“时平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诵其词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为古今绝唱也。”〔二〕这时，除了“吴若本”之外，见于著录而今不传的有郑邛杜诗音义、黄长睿校定杜工部集等校本。据苕溪渔隐丛话作者胡仔当时所见即有八种之多，可能还不止此。〔三〕从这个时期起，对于杜诗不仅收录较前为多，“校仇益号精益”，并开始了编年和注释等工作。

〔一〕 参看钱注杜诗“略例”。

〔二〕 参看本书的附录李纲校定杜工部集序。

〔三〕 参看渔隐丛话后集第八卷。“苕溪渔隐曰：‘子美诗集，余所有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则润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则内翰王原叔洙所注也。改正王内翰注杜工部集，则王宁祖也。补注杜工部集，则学士薛梦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则黄长睿伯思也。重编少陵先生集并正异，则东莱蔡兴宗也。注杜诗补遗正谬集，则城南杜田也。少陵诗谱论，则缙云鲍彪也。不知余所未见者，更有何集，继当访之。’”

二 关于杜诗的注释

自宋以来，历代对于杜诗进行编辑加工整理的人颇多。见于著录而其书不传的有鲍钦止（慎由）、王彦辅、鲍彪（文虎）、薛苍舒、杜田（时可）、师古、薛梦符、杜修可等人是较为著名的。坊间书估从此时起纷起刻书，于是便有“集注本”的出现。先有“十家”，后有“二十家”、“六十家”、“百家”，以至于号称“千家”。这一些虽为书估的夸张之词，然注家之多也于此可见。其姓氏见于著录者约一百五十余家，〔一〕实际上当不止此数，自宋迄清，历代都有增加，就“全集本”来说，较为著名的也不下二十余种。九家集注和草堂诗笺为较早出现的“集注”性的版本，它们为后来的注释杜诗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打下了初步的基础，特别是草堂诗笺，虽然有不少杜诗研究者对于此书多所贬抑，但在注解、笺释杜诗的历史进程中，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积极作用。虽然其中也有不少穿凿附会谬误之处，但它综合了唐、宋以来一些研究、注释的成果，“先正其字之异同，次审其音之反切，方作诗之义以释之，复引经史子传以证其用事之所出”，〔二〕这一些工作都很有价值，对于后来的注释者是颇有启发的。元代和明代的杜诗研究者多偏重于评点工作，他们虽偶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但从事于切实的注释工作的则寥寥无几；到了清代，笺

〔一〕 参看四部丛刊影印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所载集注杜诗姓氏。（其中亦有伪造者。）

〔二〕 参看本书的附录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跋。

释和注解杜诗才蔚然成风。钱（谦益）笺、朱（鹤龄）注对于杜诗中有关唐代历史、地理、职官制度比较确切的考证，经史子集以及佛经道藏典故比较可靠的征引，纠正了前人注释中不少谬误，删芟芜杂，廓清迷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仇兆鳌的详注可以说是集杜诗注释的大成，特别是对于杜诗的编年工作，虽然也有一些臆测，但大体上是比较合理的，对于我们阅读和研究杜诗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仇兆鳌对于他的杜诗详注自视颇高，自清初以来也为不少研究者所推崇，但是，他把明、清时代作八股文“起承转合”的固定格式，用来解说和评论杜诗；同时又过多地征引某些不必要的古代诗文的片言只语来诠释杜诗，这些解说、评论、征引和诠释，不免给人以烦琐之感。自仇注出现以后，旧时注释杜诗者大概没有超过他的规模，而浦（起龙）注和杨（伦）注的简洁明了，要言不烦，却能一新读者的耳目，并给读者以比较明确的概念，间亦有比较新颖的见解，对于理解杜诗也是有益的。

对于历代杜诗的注释，我们也应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比较诸家注释的异同，取其简明、扼要而又精确者，去其迂腐、浅陋、冗杂者，特别是要避免牵强附会、望文生义、伪造故实之弊。力求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这样做对于理解杜诗可能是更为有益的。

为了上述目的，也为了节约读者的时间，减少翻检群书之劳，编者试图把历代诸家杜诗注释，有选择地编成这一个带有“集解”性质的本子。这里所说的“集解”，不是全部的巨细无遗的汇集，它的重点主要在于对杜诗历史事实的考证和艺术技巧的分析这两个方面，而对于一般字句的解释则不多作征

引。

对于杜诗历史事实的考证和艺术技巧的分析，在前人的注释中占了很多篇幅，特别是在清人的注释中，如钱笺、朱注、仇注、浦注等，做得更为充分，且有不少创见，但有些地方也还有若干舛误，需要进行订正和补充。更为重要的是，上列诸家的工作成果，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如对于杜诗中所谓“忠君爱国”的思想，随处妄加比附；而在注释方法上也未能脱出历来评点家的窠臼，如囿于所谓“无一字无来处”的陈说，并以此来诠释杜诗，把读者引入歧途。这些就是他们的较为突出的弊端。而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我们，则应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和运用现代人的研究成果，他们对于杜甫和他的诗篇所作出的科学分析，这对于理解杜诗则是更有帮助的。因此，在这个“集解”性质的本子里，除了古代诸家注释之外，也酌量吸收了近代、现代一些研究工作成果，以供读者参考。

三 杜甫和他的诗篇

杜甫的诗篇为什么具有如此永久的魅力？（自它产生以来，历代都吸引着广大的读者；直到现在，其中某些篇章还激动着人心。）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清代和清代以前历代的研究家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用封建主义的观点来衡量杜甫和他的诗篇，他们在笺注和评论中，反复强调杜甫之所以伟大，杜诗之所以感人，就是在于杜

甫“每饭不忘君”的忠君爱国思想。他们从这一个基本的论点出发，对于杜甫的生平和创作，杜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出了各种解释。近代资产阶级的某些研究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封建阶级的政治和艺术的观点，在他们的学术论著中也大量地宣传了类似的观点。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杜甫和他的诗篇呢？

我们评价杜甫和他的诗篇，根本上不是从某一个固定的观念出发，而是从诗人的社会实践出发。诗人杜甫的创作源泉只能来自他的社会实践，作为唐代社会生活之反映的丰富多采的杜甫诗篇，决不是忠君爱国这一个概念所能概括得了的。就说杜甫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吧，这一思想也是他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既然生活在现代世界上的文学家、艺术家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末，古代的诗人与自然也不会例外。

在杜甫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即使在开元、天宝的所谓“盛世”，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对基本矛盾，虽然在表面上暂时趋于缓和，但并没有消失。由于唐代封建统治者为了满足其腐朽的宫廷贵族生活的需要，便加紧压迫和剥削农民；为了满足其开边拓地的贪婪欲望，便不断发动与边境民族之间的战争，这就更加重了农民的赋税和徭役的负担。而在封建阶级内部，由于争夺权力和财富，也经常展开剧烈的斗争。“安史之乱”便是这许多矛盾的总爆发。它虽然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在实质上却暴露了唐代封建阶级的腐朽，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在唐代历史上，“安史之乱”是一个转折点。延续了七八年之久的战争和因战

争而带来的混乱，促使一个繁荣昌盛的帝国走向崩溃没落，一个集中统一的帝国走向割据分裂。这场灾难性的变乱，真正的受害者，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经过这场变乱，更加痛苦地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诗人杜甫在他的不朽诗篇中，对于这一个充满着矛盾的时代，作出了深刻的反映。作为唐代由承平到动乱时代真实写照的杜诗，不仅广泛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面貌，而且以深切同情的态度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他还运用了完美的艺术形式，精炼的艺术语言，鲜明、准确而生动地表现了他的爱和憎。从反映“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人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看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杜甫的诗篇比起唐代其他诗人的诗篇来，显得更深刻、更具体、更生动、也更丰富多采。尤其突出的是，在诗人的笔下，他的同情是明显地倾向于人民一边的。杜甫在他的许多诗篇中，对于唐代大小封建统治者进行了有时是委婉的、有时却又是严厉的谴责，而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则怀着深厚的同情，不断地为他们的苦难和不幸而呼号、而抗争，因此，虽在千载之下，犹能激动我们的心灵。这怎么能够用狭隘的忠君爱国这一个观念去解释和评价内容异常丰富的杜甫诗篇呢？

杜甫的诗篇不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高出于他同时代诗人的作品，只有李白的诗篇能够和它并驾齐驱。古人和今人曾经多次写过李杜优劣论，已经作出了详细的具体的分析。在这一个方面，我不准备在这篇前言里多去谈论。在这里，我只想把杜甫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些诗人作一个极其简略的对照，其目的也不是在于抬高杜甫来贬低其他诗人。在百花盛开的唐代诗坛，前于杜甫、或者是和杜甫同时代以及在杜甫之后，出现了大

批优秀诗人，他们的著名诗篇也是祖国文学的瑰宝，我们不应该妄加菲薄；和杜甫诗篇同样，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诗歌的借鉴，也应该由我们去加以批判地继承。我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仍然是在于说明创作的源泉只能来自社会实践。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如果说现代的革命的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那末，我们考察古代文艺作品，判断它们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就必须首先检验它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杜甫的诗篇为什么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高出于他同时代诗人的作品，其最根本的原因也就在于杜甫创作这些诗篇的时候，较之他同时代的诗人更接近于底层人民生活的原故。

杜甫早期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很少，大部分都散失了。就现存的游龙门奉先寺、望岳、登兖州城楼等篇看来，可以说已经开始显示他的刚健、清新的特色，但是，我们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杜甫的诗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和他同辈诗人有多大的悬殊。稍后的陪李北海宴历下亭、郑驸马宅宴洞中等应酬之作，更可以视为杜诗中的糟粕，似乎还带有几分庸俗的气味。只是在乐游园歌、病后过王倚饮赠歌等诗中，才开始写出了自己的个性和时代的气息；在丽人行、兵车行等诗中才初露出诗人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本领。杜甫之所以为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第一次发出了令人战栗的呼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是他十年困居长安，长期观察生活的结果。他尖锐地揭露了唐代社会生活中不可调和的矛盾，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由于荒淫无度和横征暴敛正孕育着即将爆发的危机。在这首诗刚刚写成之后不久，“安史之乱”

就爆发了！这当然不是一个巧合。“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这不仅是杜甫个人生活的写照，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的缩影。艰难の時势促使杜甫从一个侍奉皇帝的低级官吏，跌落在颠沛流离的人群之中，促使他在大变动的时代里有机会接触人民的生活，有可能了解人民生活中的疾苦。杜甫之所以为杜甫，就在于他不绕开这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而是面对着穷困、饥饿、疾病、死亡，继续在苦难的道路上顽强地挣扎跋涉，从此永远离开了那可厌的宫廷生活，在可悲的流离转徙之中度过了他的一生，为我们唱出了一首又一首动人的哀歌。作为一个爱国诗人，虽在艰难困苦之中，他始终没有抛弃自己的崇高理想，他不断地对祖国、对人民、对未来的美好生活放声歌唱；同时他更是一个政治诗人，他所最关怀的仍然是人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表达了当时处于无权状态的被压迫人民想要表达而无法表达的愿望，发出了沉痛的悲愤的呼声！

从“安史之乱”以后，那些曾经在开元、天宝“盛世”一度获得盛名的诗人，例如后世称之为“田园诗人”的王（维）、孟（浩然），“边塞诗人”的高（适）、岑（参），一个个都歇响了，只有杜甫“忆在潼关诗兴多”，高唱出了苦难时代的最强音。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时刻关心祖国和人民命运的热情的政治诗人，而不是一个狭隘的忠君爱国者、封建统治阶级的奴仆，杜甫从“安史之乱”起，真正地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在祖国、人民和个人都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他拿起了如椽的巨笔，在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千古绝唱中，在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等一系列著名的政治诗